

冷战 国际史研究系列

旧金山媾和 与中国

王蕾 著



世界·中国 出版社

冷战 国际史研究系列

旧金山媾和 与中国

王 蕾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王蕾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012 - 3469 - 1

I. 旧… II. 王… III.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345 号

书 名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 (1945—1952)
Jiujinshan Gouhe Yu Zhongguo (1945 - 1952)

作 者 王 蕾 著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嘉 维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李 琴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22¼ 印张

字 数 35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469 - 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 编委会

主 编 牛大勇（北京大学）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

编 委 （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具体言之，这种国际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其二，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插足各国国内政治，间接支持执政党与共产党的权力之争；其三，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两大集团的一方，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事实上也基本没有摆脱美苏大国竞争的范式。总之，在冷战期间，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无论如何是一般国际关系史所囊括不了的。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1990年代初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创立伊始便使用了“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新概念。

随着1993年冷战对峙的主体国家之一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只有特定意义的阶段结束了。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等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

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态。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原来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国家档案文献的加速解密并刊布，特别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俄国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大量而有序的开放，以及中国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布。这些新的原始材料的出现，不仅令各国学者耳目一新，增强了质疑问难的兴趣和信心，而且更为研究者重新考量和还原真实的冷战历史提供了基本条件。可以说，新的档案文献的陆续面世，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真正从冷战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史，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冷战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特别是充分利用最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材料探索历史真相，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共同讨论冷战历史问题，应该说是从“新冷战史”研究兴起时开始的。此后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某些领域中颇有建树，例如对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等，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种状况构成了在中国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起点。

纵览近两年来中国冷战史学科的建设，以研究领域论之，探索的范围不断拓展，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争议课题，而且开始将视角投向研究相对薄弱或呈现空白的区域，无论是冷战在亚洲的兴起，欧洲冷战的起源与发展，还是全球冷战的演变，等等，诸种课题都有学者问津，尤其是对亚洲冷战起源复杂性的讨论，进一步向以美苏为中心的冷战史观提出了挑战。就研究方法而言，多国档案的利用层面继续扩大，在厚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事实证性研究，细致地重新检视冷战对峙的痕迹，严谨地厘清历史演变的脉络，客观地剖析及思辨传统结论的思维支点，已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突出特色。而从研究队伍观之，一批年轻学者加入到冷战史研究的行列中，其

壮大了研究队伍，并为这个新兴学科的成长，注入了更多的活跃因子。中国冷战史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不仅高水平学者的高质量作品受到国外冷战史学界的密切关注，而且在研究的群体层面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学者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冷战史研究译著，以及口述历史著作。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国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8年7月

序

1951年9月由美国导演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开掘了东北亚国家之间的鸿沟，加剧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对东亚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多年来，有关旧金山媾和研究的学术成果连绵而至，尤其是美、日学界，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也出版了多部著作。相形之下，我国在当年曾出版过若干资料，但研究工作未能展开。

近年来，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有着较好英文、日文的能力，又遇国际文化交流的天时与地利，可到美国或日本搜集资料，以了解最新学术研究动态，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他们是一支生力军，突起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他们以探索的新姿态进入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取得堪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话语权。王蕾博士的新著《旧金山媾和与中国》（以下简称“王著”），就是这样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新作，展示了中国学者在此课题中的研究进展。

王蕾的新著之所以新，是因其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以下几点新观察：

第一，重新审视了中美日俄（苏）四国利益冲突和多边关系的框架。在东北亚近现代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每逢历史的关键时刻，中美日俄（苏）多边关系总会因之而互动。从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和俄国普提亚廷舰队的先后冲击日本的锁国之门、甲午战争之前俄国和美国参与中日争端的调停、《朴茨茅斯和约》在美国签订，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苏美援华航空队来华参战，特别是雅尔塔会议及其秘密协定的订立、《波茨坦公告》的发表、中美苏联合摧毁“大日本帝国”，乃至二战后美苏冷战、中苏缔盟、美国转变对日政策、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特需”景气的不期而至、旧金山对日媾和等等，无不展现出四国角逐的“合力”。

“王著”正是从以上四国关系的演进入手，特别指明，进入20世

纪后，美国在东亚最大的对手一直是日本，太平洋战争是美日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在东亚的对手是苏联和日本，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潜在的。相形之下，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手。 “王著”选择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美日苏四国的互动关系，来探讨旧金山媾和过程中的中国因素及中美关系演化，一下子抓住了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的要领。由此承上，可追踪近代四国关系的轨迹，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由此启下，可以就旧金山媾和会议后四国关系乃至今后的趋势，溯源探本，做出有远见的展望和预测。实际上，探讨中美日俄（苏）多边关系之演进，恐怕是研究东北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魅力无穷的大题目，值得学者为此付出锲而不舍的努力。

第二，重新审视了美国对华政策在战时和战后发生逆转的原因。“王著”认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美国在东亚不仅不打算以中国为对手，而且还一直想借重和支持中国。美国传统的东亚政策是将维护中国的稳定作为东亚稳定的基本要素。美国曾宣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并为此一直坚持“门户开放原则”。按照二战时期美国对战后东亚的设想，东亚的权力格局应该以美中关系为基础。美国准备“使中国成为大国”，并作为“亚洲警察”，以监督潜在敌人日本和制衡现实的手苏联。

但是，冷战使东亚国际形势出现骤变，美国的东亚政策由此作出重大调整。旧金山媾和会议正是这一调整的鲜明标志。“王著”认为，旧金山媾和使中、日角色易位，美国与宿敌日本化敌为友，二战时的盟友中国却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朝鲜战争的爆发，推进了旧金山媾和。美国把中国定位为东亚的头号敌人，美中的敌对程度甚至超过了此期的美苏。

将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媾和视为导致中美长期对抗的基本原因，以此说明美国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缘由，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朝鲜战争加速美国远东政策调整步伐，美国导演下的旧金山媾和会议，则完成了其以日本为盟友、以中国为敌手的基调变换，并在此后的20余年间，成为美国最基本的远东政策。

第三，重新审视了旧金山媾和对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王著”认为，日本得到美国的各种扶植、援助和保护，全力发展经济，而中国正好相反，旧金山媾和封闭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大门，至1970年代才开启。美日同盟的存在，对中国是一大制约。大陆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

与台湾关系也因此而扭曲，两岸的统一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长时期的敌对性的封锁隔离政策，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

众所周知，中苏缔盟后苏联在中国援建的一百五十余个项目，以及对先前的官僚资本产业和日本掠夺性殖民开发遗产的接受和改造，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基础。相对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建设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的工业化水准相比较，差距显而易见。而中国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缩小与先进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始于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在此期间，中美从对话到建交，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扭转了旧金山媾和框架下的美日联手，敌视、对抗中国的基调，也使得美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进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王著”将旧金山媾和会议作为东亚国际关系转换的关节点，并就此观察中美日三国关系的互动，也正是恰到好处。

第四，重新审视了旧金山媾和会议前后美国东亚政策和中国因素之间的关联。此是“王著”通篇论述的重点、纲举目张的“纲”。其章节布局循此视角而逐一展开。“王著”认为，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考量中，对日媾和并不是单纯孤立的，而与美国对华政策相互联结；因此，在研究美国导演的旧金山媾和过程中，探寻其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苏结盟以及出兵抗美援朝等“中国变局”之间的互动关系。

正如“王著”所说，旧金山媾和已是学术界研究得相当深入的一个题目，几乎所有的研究著作都言及它与中国问题的关联，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系统的讨论。确实如此，中外学术界探讨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旧金山媾和会议等问题时，都会涉及中国因素对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但如何立足于东亚近现代的历史，长时段近距离地集中说明中国因素对旧金山媾和过程中如何发挥和怎样发挥作用，清楚交代来龙去脉，至今尚无成熟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王著”的学术创新，又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如此，“王著”从美国占领菲律宾、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起笔，循序追述了义和团事件、日俄战争、“二十一条要求”、中日山东问题争端、华盛顿会议、“东方会议”、“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美日谈判、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对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的演变轨迹及内在逻辑关系，进行连贯性的探讨与思考。其论述的核心，在于说明美国在

远东战略依托点的选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选择了日本；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远东战略依托从日本转到中国；而二次大战后东亚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使美国将远东战略依托，从中国再次转移到日本。后一转移，对旧金山媾和过程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因为如此，中国因素及其作用，构成重新审视旧金山媾和的一条主线。以往中外学术界对中国因素所进行的分散和背景式的研究，由“王著”出版而进至全面、系统和集中论述的阶段。这是“王著”特色独具的学术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王蕾博士的这部著作，最初是在北京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她在国内搜集、整理了各种中文史料及研究著述，又赴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研修近两年，搜集、整理了日、英文史料及研究著述。这为她学位论文的完成打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在读博期间，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跨世纪转变与崛起》的科研，发表了《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与地区国际格局探析》、《围绕〈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有关问题的再探讨》等论文，具备了独自进行开创性科研的能力。博士毕业后，她就职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又在该院领导的支持下，2007年获准前往日本爱知大学研修一年。她利用“二进宫”的宝贵机会，搜集、补充大量英、日文史料，并对原稿进行修订，精雕细刻，文稿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这是王蕾博士多年用功的著作，今获出版，可庆可贺。

宋成有

2008年仲夏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绪 论

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是一座与中国有着特殊关联的城市。

历史上的旧金山是有名的海外华人聚居地。旧金山这个名字是华人用的，它的英文原名是 San Francisco，汉语翻译为圣弗朗西斯科。^①

华人之所以称 San Francisco 为旧金山是同 19 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联系在一起的。1848 年，在这附近发现了金矿，令原本偏僻寂静默默无闻的小镇从此变得赫赫有名。为发财梦想所推动的淘金者从全球各地蜂拥而至，小镇便迅速繁荣了起来。淘金者们对各种服务的需求，也将散落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劳工吸引来此地谋生。当时的华工一般都不通英文，也不习惯洋文地名绕口的发音，于是，一些人便将圣弗朗西斯科的发音简化为“三藩”，有的人则按中文的语言习惯，简单而贴切地称这里为“金山”。后来，新的淘金地又被发现，这里便成为“旧金山”了。

当年淘金热的升温，使得旧金山的华人聚居地——“中国城”（China Town）——变得非常有名。中国城不仅成为旧金山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发展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海外华人聚居地。

今天，旧金山的中国城中仍生活着大量的中国人，中国城的规模仍堪称海外之最。漫步城中，依山而建的层层街道林立着各种各样的中国餐馆、药店、杂货店以及会馆，各色醒目的汉字招牌，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商业旅游气息。这里很像香港，但又有所不同。长期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给人的感觉是动态的，似乎在追逐时代的潮流，而这里却似乎是静

^① 旧金山最初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1776 年，西班牙人在此建立了要塞和传教区，并称其为耶尔巴布埃那（Yerba Buena）。1846 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对该城市的控制权后改称为 San Francisco。

态的，让人感到时间只是在静静地流逝。公园里三五成群打麻将、打扑克、下棋、闲聊的中国人，与在许多中国南方小城所感受到的最为普通世俗的中国人似乎没什么两样，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华人在此生活创业的艰辛，感触之余，更令人唏嘘不已。

在这座城市的另一部分，宏伟的旧金山歌剧院成为市政中心广场周围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51年9月4—8日，美国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对日和平会议，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年之后。当时，52个国家的代表汇聚于此，集中讨论缔结对日和平条约的问题。经过了几天的唇枪舌战，最后，9月8日上午10时，有48个国家的代表同日本签署了结束战争状态的《对日和约》。

一般而言，在战争结束后所签署的和平条约，一方面是战争状态在法律上正式终结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确立战后新国际关系的起点。旧金山《对日和约》也同样，它既是太平洋战争在法律上终结的标志，也是亚太地区新的国际格局确立的起点。

不过，身为主要对日作战国、经过了8年的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却既没有被邀请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也没有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签字。旧金山对日和会和旧金山《对日和约》，成了中国当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历史见证。

这，使得中国人对这个太平洋彼岸的与中国有着历史渊源的美国城市，又多了一份复杂异样的感触……

我是从博士在读的2001年起，决定把旧金山对日媾和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由于旧金山媾和是探讨东亚冷战起源、战后日美特殊关系形成、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确立等重要问题的根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有关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经久不衰的关注热点。每当相关档案文件解密和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总会引起学术界的一番热烈的讨论。而2001年恰逢旧金山和会召开50周年，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举行和研究讨论的展开，这个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某种意义上，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讨论旧金山媾和都很容易流于老生常谈。因为从1950年代至今，有关旧金山媾和问题的研究各种各样、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

数不胜数。

这些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950、1960年代入江啓四郎的《日本媾和条约的研究》^①、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的《和平条约的综合研究》^②、阿杜瓦德的《日本：从投降到媾和》^③、科恩的《政治过程与外交政策：对日媾和》^④、邓恩的《媾和与对日处理》^⑤；1970年代西村熊雄的《旧金山和平条约》^⑥、普鲁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对日和约》^⑦、杰因的《战后对日媾和》^⑧、约翰·道尔的《帝国及其后果：吉田茂与日本的经验，1878—1954》^⑨；1980年代罗格·巴克利的《占领外交：英国、美国与日本，1945—1952》^⑩、托马斯·巴克曼主编的《对日本的占领：国际关联》^⑪、袖井林二郎主编《世界史中的日本

① 入江啓四郎『日本講和条約の研究』（板垣書局、1951年）

② 国際法学会『平和条約の総合研究』（上、下巻）（有斐閣、1953年）。

③ E. J. Lewe Van Aduard, *Japan: From Surrender to Pea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3)。

④ Bernard C. Cohen,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Making of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⑤ Fredrick S. Dunn, *Peace-Making and the Settlement with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⑥ 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 27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鹿島出版会、1971年）。

⑦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⑧ R. K. Jain, *Japan's Postwar Peace Settlements*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8)。

⑨ 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 19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⑩ Roger Buckley, *Occupation Diplomac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45 - 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⑪ Thomas W. Burkman e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 Proceeding of the Fifth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the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21 - 22 October 1982* (Norfolk, Va.: the MacArthur Memorial Foundation, 1984)。(here-after cited as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这是1982年10月在美国老多米尼恩大学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召开的由麦克阿瑟纪念基金会赞助的第五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占领》^①、迈克尔·M. Yoshitsu 的《日本与旧金山媾和》^②、细谷千博的《旧金山媾和之路》^③、迈克尔·沙勒的《亚洲冷战与日本复兴》^④、渡边昭夫与宫里政玄主编的《旧金山媾和》^⑤、五十岚武士的《对日媾和与冷战》^⑥、霍华德·斯科恩伯格的《战争的后果：美国人与日本的重建，1945—1952》^⑦；以及 1990 年代三浦阳一的《吉田茂与旧金山媾和》^⑧、日本现代史学会 1999 年编的年报《媾和问题与亚洲》^⑨ 等等。

它们之中，既有研究媾和总体过程的，如邓恩的《媾和与对日处理》、西村熊雄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有专门着眼于媾和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如细谷千博的《旧金山媾和之路》、五十岚武士的《对日媾和与冷战》；既有注重国内政治过程与媾和关系的，如科恩的《政治过程与外交政策：对日媾和》，也有专门研究媾和中具体历史人物的作用以及具体问题的处理的，如普鲁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对日和约》、三浦阳一的《吉田茂与旧金山媾和》，以及各论文集中所收录的有关具体各国的对日媾和政策与赔偿问题的诸多论文等。由于这些研究对旧金山媾和进行了反复而充分的讨论，使我们得到了有关旧金山媾和全过程——从起因到结果——颇为清晰的认识轮廓。

目前，对于旧金山媾和，学界在下述方面已形成基本共识：

第一，旧金山和会是由美国一手策划、并由美英共同发起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是美英联合起草的，同日本签约的 48 个国家都是

① 袖井林二郎编『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日本評論社、1985 年）。这是 1983 年在东京日本法政大学召开的“世界史中的日本占领”（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in World History）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② Michael M. Yoshitsu, *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细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 年）。

④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5)。该书中文译本为《亚洲冷战与日本复兴》，作者迈克尔·沙勒，译者郭俊铄，台湾金禾公司 1991 年出版发行。

⑤ 渡边昭夫·宫里政玄『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 年 1 月）。

⑥ 五十嵐武士『対日講和と冷戦』（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 年 7 月）。

⑦ 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 - 1952* (Kent,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⑧ 三浦陽一『吉田茂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上、下）（大月書店、1996 年 9 月）。

⑨ 『講和問題とアジア』、年報・日本現代史 1999 年第 5 号（現代史料出版社、1999 年 8 月）。

旧金山媾和与中国（1945—1952）

亲西方的，媾和排除了与日本的主要交战国中国的参加，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对美国不满拒绝与会，与会的东方阵营三国——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在《对日和约》上签字。因此，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所有国家期待并要求的对日“全面媾和”相反，这是一个在美国主导下的“单独”、或曰“片面”的媾和；旧金山《对日和约》所反映的，也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的意愿。

第二，这样的对日媾和方式及其《对日和约》之所以产生，与战后两大事件——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大原因导致主导媾和的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目的，在战略上重新重视战时敌人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

第三，正因为考虑要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旧金山《对日和约》变成了有史以来几乎是最为宽大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其内容非常符合美国标榜的人道主义精神，既少限制也无惩罚。按照美国的设计，赔偿越少越好，甚至可以不需要。

第四，旧金山媾和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仅仅6年后，美国便把战争中殊死较量的敌人转变成了自己在东亚最大的盟友和伙伴，通过与旧金山《对日和约》一体的《美日安全条约》和“美日行政协定”等，确立了新的美日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以此形成了美日同盟与中苏同盟对峙的东亚冷战国际格局。这一格局主导了东亚20余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被打破。

第五，作为媾和对象的日本所付出的“代价”，是以重新武装和提供美军驻日基地，让自己“搭上”了美国的便车——既有经济的，也有安全的：日本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也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不显山不露水，安享太平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这些认识让人感到，对旧金山媾和历史过程的讨论似可告一段落。

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从在东亚的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旧金山媾和却有很多问题还值得反思。

第一，旧金山媾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手，可是，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在东亚的竞争对手都不应该是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仍然只是一个穷国和弱国。中国的实力，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不成其为美国的手。

第二，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在东亚最大的竞争对手一直是日本，太平洋战争是美日竞争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和日本，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潜在的。

第三，很长一个时期，美国在东亚不仅不打算以中国为对手，而且还一直想借重和支持中国。美国传统的东亚政策是将维护中国的稳定作为东亚稳定的基本要素。美国曾宣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并为此一直宣布要坚持对华“门户开放原则”。

第四，按照二战时期美国对战后东亚的设想，东亚的权力格局应该以中美关系为基础，美国准备“使中国成为大国”，并作为“亚洲警察”，发挥监督潜在敌人日本和制衡现实对手苏联的作用。但是，旧金山媾和却使中日的角色易位，美国与宿敌日本化敌为友，盟友中国却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推进的旧金山媾和把中国定位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头号敌人，中美敌对的调子甚至超过了尖锐冷战中的美苏。

第五，与日本正好相反，对中国而言，旧金山媾和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借美国扶植成为亚洲大国、借中美关系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反而导致了对其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之门因此被封闭 20 余年，到 1970 年代才开启，至今日美同盟的存在也对中国是制约。大陆与台湾关系也因此而更扭曲，台海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中国本身则由于美国敌对的封锁隔离，失去了发展的有利时机，耽误了最迫切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这些问题，让我把对旧金山媾和问题的思考与美国的东亚政策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显然，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考虑中，对日媾和并不是单纯孤立的决策，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是相互联结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探究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媾和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变局——国共内战以致新中国建立、台海两岸政权分立——的关系。

在清理先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尽管旧金山媾和已是学术界研究得相当透彻的一个题目，几乎所有关于旧金山媾和研究的著作都谈到它与中国问题的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却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讨论。有关的研究可以说既多也不多。比较详细的相关论述大致只有：Wang Yu San 的博士论文《中日和平谈判与处理》，从二战时中